

平台经济发展的创业效应

——来自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戴魁早 龙欣宇 王思曼

摘要: 本文结合当前平台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县域亟须提升创业活跃度的现实背景,研究平台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县域创业活跃度,并探讨营商环境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平台经济发展提高了县域创业活跃度,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创业成本和创业机会视角来看,平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交易成本降低、物流成本降低、市场需求扩大和服务业态多样化等机制实现的。营商环境的改善强化了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效果。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高铁开通县域、流动人口较高县域以及位于商帮文化发源地县域的提高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认识和理解平台经济发展在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中的作用提供了参考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县域创新创业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 平台经济 县域创业活跃度 创业成本 创业机会 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 F323.6; F7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36(2026)02-0155-14

一、问题提出

创业是县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升级、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①发挥了重要作用^[1]。近年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创业,各级县域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重点支持,县域创业呈现强劲发展势头并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目前中国县域创业面临人才、资金等创业资源匮乏,本地市场空间狭小、创业机会较少等现实问题,县域创业活跃水平相对较低。现有文献强调政府规制、融资渠道、税收减免、创新驱动政策、行政审批制度等多种因素对提高创业活跃度的重要作用^[2-5],在互联网、大数据等

收稿日期:2025-06-19;修回日期:2026-01-20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24ZDA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及调控政策研究”(72173042);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对数实融合的影响机理与政策协同研究”(24JD012)

作者简介:戴魁早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411201;

龙欣宇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思曼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讲师,通信作者。

①《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创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纵向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正在发展的平台经济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平台经济是一种由平台基础设施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或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新经济模式),具有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性等特征,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理论上,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交叉网络外部性,既能有效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还能发现未被注意到的盈利机会和创业机会^[6-8],进而很可能对县域创业活跃度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平台经济发展能否有效促进县域创业活跃度提升?

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平台经济发展观察(2023年)》《平台经济发展观察(2024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中国价值超10亿美元平台企业共167家,比2015年增加100家;2015—2022年,企业价值由0.80亿美元增长到2.37万亿美元;2023年,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平台企业总营收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7%,总净利润高达3854.4亿元,同比增长42.4%。然而,中国平台经济仍存在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运行机制亟待完善等突出问题,平台经济市场规模和发展空间仍较大。由此可见,平台经济很可能是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新动能,平台经济发展影响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基本规律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文献是关于平台经济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部分文献从宏观层面展开了探讨,研究发现,平台经济不仅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9]、城乡融合发展^[10]、县域产业结构升级^[11],还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还有部分文献从微观层面探究了平台经济如何影响县域居民收入增长^[13]、就业选择^[14]、福利改善^[15]。但上述文献并未回答平台经济发展是否促进了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第二类文献是关于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文献重点探讨了数字经济在创业活跃度提升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提升地区创业活跃度^[16-18],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交易成本^[16]、减少信息搜索成本^[17]、降低制度成本和行政成本^[18]等机制实现的。有文献探讨了其他因素对创业活跃度的重要影响,如行政审批制度^[2]、创业环境^[3,19-20]、创新驱动政策^[4]、金融体系完善^[5]等。此外,也有文献讨论了不同类型平台入驻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然而,平台经济整体发展情况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类文献与本文最为相关,探讨了平台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代表性文献仅有程聪慧和刘昱呈^[20]的研究。该文从平台化基础设施、平台化应用和平台化产出等方面构建了平台经济发展指标,探究了平台经济如何通过降低农村居民创业难度、吸引资本流入和劳动力回流等机制提高农村创业活跃度。然而,就研究视角而言,该文并非从县域层面考察,不能准确刻画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就影响机制而言,该文并未从创业成本和创业机会视角系统探讨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实际上,创业成本是提升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创业机会能驱动市场竞争,提高创业活跃度。而平台经济发展不仅能够通过缓解供需两端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降低创业成本,还能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搜索和发现未被注意到的创业机会。因而,平台经济发展很可能通过降低创业成本和增加创业机会等机制促进县域创业活跃度提升。就研究内容而言,该文并未涉及营商环境的可能影响。现有文献的局限为本文的研

究提供了可能的突破空间。

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从创业机会和创业成本视角,探究平台经济发展作用于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机制;进一步地,考察营商环境这一“有形之手”在平台经济发展促进县域创业活跃度中的作用。本文的可能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框架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机制,拓展了平台经济发展和创业活动的研究领域;(2)在机制分析方面,从创业成本和创业机会视角,探究平台经济发展如何通过交易成本降低、物流成本降低、市场需求扩大以及服务业态多样化等机制作用于县域创业活跃度,有助于加深对平台经济发展影响县域创业活跃度内在规律的认识和理解;(3)结合中国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营商环境得到了持续优化这一客观事实,探讨了营商环境在平台经济发展促进县域创业活跃度中的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这丰富了平台经济发展与县域创业活动的研究内容,在政策层面有更明确的启示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鉴于创业机会与创业成本是影响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关键因素,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增加县域的创业机会、降低县域的创业成本。结合中国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这一客观事实,本文从机会和成本视角探讨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一) 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根据创业决策的效果逻辑理论^[21-22],在创业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创业者通常会寻找利益相关者联盟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合作伙伴,在这一过程中能带动地区产生更多创业活动^[7,22]。实际上,平台经济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将两个或者多个相互独立的团体联通起来,发挥其强大的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利益相关者联盟。因而,平台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县域新创企业建立利益相关者联盟,增加创业成功概率;还能够给县域新创企业带来更多的要素资源,缓解新创企业在创业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而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平台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

从机会和成本视角来看,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交叉网络外部性,既能有效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还能搜索和发现未被注意到的盈利机会和创业机会^[6-8,23]。鉴于创业成本降低是影响创业活跃度的核心要素之一^[24];而识别和发现市场上潜在的创业机会能驱动市场竞争,进而引发更多创业行为。由此可以推测,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可以通过降低县域创业成本、增加县域创业机会等机制来实现。

第一,县域创业成本降低机制。依据传统创业要素理论,创业成本降低是提升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关键驱动因素^[24]。理论上,平台经济发展能借助数字技术丰富决策信息获取手段,给新创企业带来更多的要素资源和用户数据信息,有助于缓解供需主体信息不对称问题^[8,18],实现客户精准营销与产销无缝衔接,进而降低创业成本。由此可以推测,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可以通过降低县域创业成本这一机制来实现。

平台经济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县域创业成本。一方面,平台经济的网络外部性作用使得用户间交易、互动产生的大量行为数据被平台收集和整合,这能降低供需两端要素资源等交易发生的信息门槛,助力新创企业降低现有交易的匹配成本和新业务的搜寻成本^[25]。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发展能为初创企业提供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初创企业实时调整和监控货物配送情况,提高物流配送准确性和效

率^[26];同时,平台进驻县域也促进了物流体系的建设,有利于优化调整物流路线和服务网点建设,能较好地提高企业物流配送速度,进而降低物流成本^[18]。

第二,县域创业机会增加机制。识别和发现市场上潜在的创业机会能驱动市场竞争,引发更多的创业行为^[27-28]。理论上,平台经济能够迅速识别潜在的套利机会以获取利润,并通过整合更多要素资源和用户数据信息,为新创企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创业机会。由此可以推测,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可以通过增加县域创业机会这一机制来实现。

实际上,平台经济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县域创业机会。一方面,平台经济发展不仅能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促进消费场景进一步延展,扩大市场需求规模,进而涌现更加多元的创业机会,还能通过数字化服务,助力新创企业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在扩大和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过程中,捕获更多新的创业机会^[8,15]。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出新业态,如仓储、广告营销等一系列服务行业,这不仅能催生出原本没有发生的新交易,还可以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催生更多的商业合作和创新,有利于识别和发现更多潜在的创业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县域创业成本、增加县域创业机会等机制实现的。

(二) 营商环境优化、平台经济发展与县域创业活跃度

上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在县域商业信用环境较好和公共服务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平台经济发展能够有效地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和充足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县域成熟的营商环境。实际上,目前地区间营商环境不均衡状况突出,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区域间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等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县域的创业成本和创业机会^[29]。由此可以推测,营商环境很可能会影响平台经济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效果。

理论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既可以激发市场活力,又可以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市场活力损失。平台经济对市场活力的激发是市场行为,发挥了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在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中的作用。同时,营商环境优化表明政府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更有作为,发挥了政府这一“有形之手”在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营商环境纳入平台经济与创业活跃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实际上,中国非常重视营商环境改善问题,各级政府也围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优化营商环境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改善了市场商业信用环境^[19]。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公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转换、信用“红黑榜”以及“信易贷”等措施的落地和执行。另一方面,随着简政放权改革措施和数字政府建设等的实施,地方政府通过统筹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能对区域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有力支持,也会对投资区位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营商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效果:一方面,营商环境成熟的县域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能较好地避免经济合同失效、低劣商品横行等商业问题,能够通过降低市场信用风险来减少外部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县域创业活跃度提升;另一方面,成熟的营商环境还体现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这有利于数据交易平台、数据算力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服务需求市场扩大,进而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还能更充分地发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助力平台提高服务质量和信息处理效率,提升县域创业者的资源禀赋和竞争力^[19],进而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优化营商环境能够增强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

四、实证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的样本区间设定为2014—2022年。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天眼查数据库,根据企业注册年份、地址以及行业等信息,将新创企业数据在县域层面汇总,获取各县域不同年度所有类型新创企业数的面板数据,并计算得到县域创业活跃度。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本文采用年度均值替换法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补齐。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此外,为消除量纲影响,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同时,为减轻异常值对估计结果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测度方法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县域创业活跃度	<i>Activity</i>	$\ln(1+\text{当年企业注册数目}/\text{年末总人口万人})$	22 847	4.445 0	0.542 4	3.409 2	6.144 6
解释变量	平台经济发展	<i>Dpe</i>	平台经济发展指数	22 847	0.100 1	0.099 8	0.076 8	0.887 2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i>Ecodev</i>	县域人均生产总值/元	22 847	39 811	42.001 9	11 302	151 842
	金融发展水平	<i>Findev</i>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县域生产总值的比值/%	22 847	0.805 9	0.388 0	0.190 8	2.328 8
	产业结构	<i>Secind</i>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县域生产总值的比值/%	22 847	0.389 3	0.145 3	0.078 5	0.764 5
	政府干预程度	<i>Govern</i>	政府财政支出与县域生产总值的比值/%	22 847	0.301 8	0.266 8	0.043 7	1.605 1
	教育水平	<i>Edu</i>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量与总人口的比值/%	22 847	0.047 5	0.012 3	0.015 4	0.254 2
	公共服务水平	<i>Public</i>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	22 847	41.388 3	13.815 9	4.664 5	215.939 9

(二) 模型设定

为考察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Activity_{it} = \alpha_0 + \alpha_1 Dpe_{it} + X'_{it} \alpha_2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 其中, i 表示县域, t 表示年份; Dpe_{it} 表示 i 县(区)在 t 年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 $Activity_{it}$ 表示 i 县(区)在 t 年的创业活跃度; μ_i 为地区固定效应, v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回归系数 α_1 ,若该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平台经济发展能够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 X'_{it} 为控制变量向量。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县域创业活跃度,本文借鉴白俊红等^[4]的做法,运用人口法来测度县域创业活跃度(Dpe_{it}),即采用新建企业数与地区人口总数的比值。具体来说,将县域年末人口数量作为标准化基数,计算得到县域每万人新建企业数量,并将这一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2. 解释变量

目前学术界关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没有统一的规范。现有的度量方法包括两种:一是采

用互联网基础设施数量、人均电子商务贸易额或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量等单一指标衡量^[30];二是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31]。两类方法各有优缺点,单一指标法测算结果的经济含义更为直观,能够较好地反映相应的经济活动,但涵盖的范围较窄;指标体系法涵盖的范围较广,但是测算结果的经济含义欠直观、清晰。

结合平台经济的概念界定,考虑到从平台基础设施、平台应用和平台产出三个层面,能更加全面地探讨平台经济发展状况,本文采用程聪慧和刘昱呈^[20]的做法,从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应用以及平台产出三方面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结合熵值法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①。从平台基础设施来看,该指标体系包括支撑平台运行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移动电话普及率等,能够体现平台基础设施状况;从平台应用和产出来看,该指标体系包括了电子商务企业占比、电子商务采购额等数据^②,可以较好地反映平台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的应用程度和产出情况。由于县域数据获取受限,在原有的省级层面数据基础上,本文借鉴范子英和赵仁杰^[32]的处理方法,以县域物流仓储用地面积占全省的比值作为权重^③,将省级层面数据推算至县域层面。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全国各县域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Ecodev*)、金融发展水平(*Findev*)、产业结构(*Secind*)、政府干预程度(*Govern*)、教育水平(*Edu*)、公共服务水平(*Public*)六个县域层面控制变量^④。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价格平减后县域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县域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度量,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教育水平采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量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公共服务水平采用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来表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2显示了平台经济发展影响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的核心解释变量平台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县域创业活跃度水平越高,验证了平台经济发展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这一理论预期。为了排除时间和空间差异带来的潜在影响,列(2)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且稳健,假设1得以验证。

① 该指标体系包括三个维度、九个二级指标。限于篇幅,这里未详细论述相关内容,具体请见程聪慧和刘昱呈^[20]的研究。

② 平台经济最深刻的变革在于交易方式的平台化,打破了传统的线下交易模式,构建了以平台为枢纽的多边参与的在线市场。电子商务企业占比能够量化依托平台经营的经济主体比例,是一个结构性指标。电子商务采购额量化了通过平台达成的商品与服务交易的总规模,是一个规模性指标。

③ 以物流仓储用地面积的比重作为权重将数据匹配到县域层面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平台经济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线下物流体系的支撑,物流仓储用地是平台线上信息流与交易转化为线下实物流通的核心基础设施,其用地规模能够直接表征某县在全省平台经济物流网络中的承载能力与枢纽重要性。第二,基于数据考虑,由于县域细分数据的匮乏,相较于网络零售额等需求侧数据,物流运输是连接供给和需求的重要渠道,物流数据能够更综合地反映供需两侧的情况。

④ 经济发展水平会提升地区创业活跃度,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域对经济活动的包容度可能更高,当地的创业活动可能更加活跃;金融体系的完善不仅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丰富创业资金来源,缓解融资约束增强创业者信心;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能为该地区创造大量的就业创业机会,第二产业的发展差异客观上反映出各地区资源禀赋和投入要素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会带来就业创业选择上的不同;政府是社会各方面的核心参与者,是培育和维持创业精神的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政府规模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存在双面性^[33];教育水平能够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反映了该县域社会基本的福利保障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就业创业的地区选择。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pe_{it}	1.555 5 ^{***} (0.063 8)	0.910 5 ^{***} (0.0975)
$Ecodev$	0.151 8 ^{***} (0.007 7)	0.085 9 ^{***} (0.012 5)
$Findev$	0.080 0 ^{***} (0.006 7)	-0.038 7 ^{**} (0.016 7)
$Secind$	0.070 9 ^{***} (0.006 9)	0.040 9 ^{**} (0.019 1)
$Govern$	0.100 6 ^{***} (0.007 8)	0.007 0 (0.014 9)
Edu	0.011 9 [*] (0.006 5)	-0.026 0 ^{**} (0.011 2)
$Public$	0.078 5 ^{***} (0.007 2)	0.088 2 ^{***} (0.013 5)
常数项	-0.156 3 ^{***} (0.008 9)	-0.091 9 ^{***} (0.009 8)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 847	22 847
R^2	0.131 9	0.650 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差。后表同。

表 3 报告了引入工具变量后的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值明显大于在 10% 偏误水平下的 16.38 的临界值, 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 且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 加入控制变量后, 内生变量平台经济发展(Dpe_{it})的回归系数未发生明显变化, 间接说明估计变量满足排他性约束, 即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因此,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由表 3 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 验证了前文主要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二) 内生性分析

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从地理层面选择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合适的工具变量既要满足与平台经济发展有高度相关性, 又对于县域创业活跃度具有外生性, 即该工具变量仅能通过平台经济发展影响县域创业活跃度。

本文选择与国家级互联网直联点的距离作为平台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就相关性而言,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是互联网流量的交换中心。距离直联点越近, 数据的传输延迟越低, 网络速度和稳定性越高, 因而距离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更近的地区有更好的平台经济发展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 与国家级互联网直联点的距离作为地区平台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满足了相关性要求。就外生性而言, 距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地理因素变量, 并不直接影响创业活跃度水平。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选取与国家级互联网直联点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外生性要求。

本文研究样本均为面板数据, 而与国家级互联网直联点的距离作为截面数据会导致难以度量的问题。因此, 本文引入时间序列变量, 构造面板工具变量, 即采用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与国家级互联网直联点的距离的交互项, 作为平台经济发展的面板工具变量。

表3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Dpe_{it}		0.9812*** (0.3301)
$ln-Dis$	0.0312*** (0.0010)	
常数项	-0.0981*** (0.0014)	-0.0940*** (0.03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847	22847
Kleibergen-Paap rk LM	20.101***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268.006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上述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通过对被解释变量重新衡量、替换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以及控制行政级别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前文基本结论稳健^①。

(四) 机制检验

1. 机制检验模型与机制变量说明

前述理论分析表明,平台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县域创业机会和降低县域创业成本来推动县域创业活跃度提升,为检验上述机制是否成立,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Mechanism_{it} = \gamma_0 + \gamma_1 Dpe_{it} + X'_{it} \gamma_2 + \mu_i + v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2)检验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 $Mechanism_{it}$ 表示机制变量集,包括增加县域创业机会机制和降低县域创业成本两大方面。式(2)重点关注 γ_1 ,若 γ_1 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有效。

关于增加县域创业机会机制的变量选取,本文从需求端的市场需求扩大和供给端的服务业多样化两方面对其进行表征。一是关于市场需求这一变量,本文参考李荣华等^[11]的做法,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的自然对数来测度。二是关于服务业态多样化这一变量,本文参考常用做法,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测度。

关于降低县域创业成本机制的变量选取,本文从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两方面对其进行衡量。关于交易成本,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先测算企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地区层面取平均值并取倒数作为销售环节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关于物流成本,选用快递物流效率,即快递业务收入与快递业务数量的比值作为物流成本下降的代理变量。其中,快递业务收入与数量数据通过检索各县(市、区)邮政管理局官网,手工整理并汇总得到。

2.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1)县域创业机会增加。从表4列(1)的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 Dpe_{it}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平台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即有利于扩大市场需求。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赵涛等^[8]的观点,即数字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产品多样化需求,而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成为创业活动开展的基础。

表4列(2)的结果显示, Dpe_{it}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平台经济发展促进了地区服务业态多样化。这验证了平台经济发展会通过服务业态多样化这一机制影响创业活跃度。该结论从平台经济的角度验证了张林和温涛^[33]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的研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服务业发展

① 具体回归结果备索。

带动了创业。

(2) 县域创业成本降低。根据表4列(3)的估计结果, Dpe_{it}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平台经济发展对降低销售费用率有促进作用,即有利于降低县域交易成本。该结论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王金杰等^[34]的研究,即电子商务可以建立隐形的市场信用规则降低创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从而激励创业。

根据表4列(4)的估计结果,平台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平台经济发展提升了县域快递物流效率,即降低了快递物流成本。该结论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丁俊发^[35]针对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的研究,即借助平台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成本的观点。

表4 平台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Dpe_{it}	0.2667*** (0.0430)	0.1884*** (0.0535)	0.1920*** (0.0246)	0.7418*** (0.0757)
常数项	-0.2864*** (0.0043)	-0.0293*** (0.0054)	-0.0205*** (0.0068)	-0.0737*** (0.00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847	22847	22847	22847
R^2	0.6418	0.6687	0.8091	0.6052

注:列(1)—列(4)的被解释变量依次为市场需求扩大机制、服务业态多样化机制、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和物流成本降低机制。

(五) 营商环境的影响

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营商环境在平台经济发展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引入交互项进行检验,即在式(1)的基础上加上营商环境与平台经济发展的交互项。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Activity_{it} = \theta_0 + \theta_1 Dpe_{it} + \theta_2 Dpe_{it} \times Envir_n + \theta_3 Envir_n + X'_{it} \theta_4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3)中, $Envir_n$ 表示营商环境变量, n 表示营商环境得分排名情况, θ_2 为平台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若 θ_2 显著为正,则说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增强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作用。

本文选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研究报告》中全国各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数作为代理指标。该指数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四个维度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能客观地反映地方在商业信用环境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发展情况。为了验证,本文参考戴魁早等^[36]的做法,采用营商环境评价指数排名来进行度量。具体来说,根据报告中的排名情况分别选取排名前25、前50和前100的地区进行详细考察。即设置3个虚拟变量: $Envir_{25}$, 营商环境得分排名前25名城市中的县域取值为1,否则为0; $Envir_{50}$, 营商环境得分排名前50名城市中的县域取值为1,否则为0; $Envir_{100}$, 营商环境得分排名前100名城市中的县域取值为1,否则为0。

2. 营商环境的影响分析

表5报告了营商环境的影响回归结果。从列(1)—列(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 $Dpe_{it} \times Envir_{25}$ 和 $Dpe_{it} \times Envir_{50}$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营商环境增强了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并且排名前50地区的营商环境的作用效果更好。根据列(5)和列(6)的回归结果, $Dpe_{it} \times Envir_{100}$ 交互项的回归

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排名第50—100名城市中的县域,未能发挥营商环境在平台经济发展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上述结论表明,营商环境较好的城市中的县域,平台经济发展能提高创业活跃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杜运周等^[19]的观点,即创业活力的激发以及新创企业的发展与制度因素紧密相关。

表5 营商环境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排名前25的县域		排名前50的县域		排名前100的县域	
	(1)	(2)	(3)	(4)	(5)	(6)
Dpe_{it}	2.2269*** (0.1186)	1.2451*** (0.1772)	1.8596*** (0.0809)	1.0966*** (0.1382)	1.2493*** (0.1291)	0.8578*** (0.1068)
$Dpe_{it} \times Envir_n$	1.1231*** (0.1379)	0.4596** (0.2108)	1.0795*** (0.1233)	0.4093** (0.1900)	0.3048 (0.2691)	0.2669 (0.2315)
常数项	-0.2719*** (0.0125)	-0.1108*** (0.0212)	-0.2746*** (0.0102)	-0.1424*** (0.0283)	-0.2479*** (0.0206)	-0.0711 (0.0526)
营商环境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847	22847	22847	22847	22847	22847
R^2	0.1655	0.6501	0.1678	0.6501	0.1627	0.6500

(六) 异质性分析

理论上,各县域特征的不同,可能造成平台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果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平台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是否存在,本文通过在基准模型(1)中引入具有县域特征的虚拟变量与平台经济发展交互项的方式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Activity_{it} = \rho_0 + \rho_1 Dpe_{it} \times D_k + \rho_2 D_k + X'_{it} \rho_3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4)中, D_k 为异质性虚拟变量集,具体表示高铁开通(GT)、人口流动(RK)和商帮文化(SW)三个虚拟变量。 ρ_1 为平台经济发展与异质性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表示由县域特征差异所导致的平台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其他符号与模型(1)一致。

1. 高铁开通的异质性

理论上,开通了高铁的县域,市场可达性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可能更高^[37],更有利于平台经济发展。由此可以推测,平台经济发展对高铁开通县域的创业活跃度提高效果可能更为显著。本文引入高铁开通的虚拟变量(GT),将某县域开通高铁的当年和以后各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根据表6列(1)的回归结果,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正,表明在高铁开通的县域,平台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2. 流动人口的异质性

理论上,有更多人口流入的县域,会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和要素供给能力,能更好地发挥平台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由此可以推测,平台经济发展对于流入人口较大县域的创业活跃度促进作用更显著。

著。本文引入流入人口占比的虚拟变量(RK)。具体而言,首先计算流入人口占比,即县域年末人口总数与县域户籍人口数的差额占县域年末人口总数的比重。其次,将高于流入人口占比平均值的县域划分为流入人口较高的县域, RK 取值为1,将低于平均值的县域划分为流入人口较低的县域, RK 取值为0。

根据表6列(2)的回归结果,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正,表明流入人口比例越大的地区,平台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3. 商帮文化的异质性

理论上,商帮文化越浓厚的地区,意味着地区经商氛围越浓厚,企业会更愿意开展深度合作^[38],有利于知识溢出和数据交易,为平台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更丰富的数据资源。由此可以推测,平台经济发展更有利于商帮文化浓厚县域的创业活跃度提升。本文参考黄勃等^[38]的做法,根据县域所在省份是否属于十大商帮文化发源地^①设置虚拟变量(SW)。如果该县域位于十大商帮文化发源地, SW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表6列(3)为引入此交互项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商帮文化发源地中的县域,平台经济发展能有效促进区域内创业活跃度提升。

表6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高铁开通	流入人口比例	商帮地区
Dpe_{it}	1.246 6*** (0.177 2)	0.909 2*** (0.097 3)	0.973 0*** (0.097 1)
$Dpe_{it} \times GT$	0.461 5** (0.210 8)		
$Dpe_{it} \times RK$		0.084 2* (0.051 0)	
$Dpe_{it} \times SW$			0.984 8*** (0.223 0)
常数项	-0.104 7* (0.055 0)	-0.069 2*** (0.011 5)	-0.092 7*** (0.013 3)
异质性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 847	22 847	22 847
R^2	0.650 1	0.650 2	0.650 8

注:列(1)—列(3)引入的虚拟变量依次为高铁开通、流入人口比例和商帮地区。

六、结论与建议

为考察平台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县域创业活跃度,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2014—2022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天眼查数据库整理得到考察期内新建的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验证。

本文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发展提升了县域创业活跃度,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营

① 本文考虑晋商、徽商、粤商、闽商、陕商、鲁商、江右、龙游、宁波、洞庭十大商帮,并将其文化发源地与目前行政区划的县市匹配。

商环境的优化强化了平台经济发展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县域创业成本和县域创业机会是平台经济发展作用于县域创业活跃度的重要途径和机制。具体来说,平台经济发展通过交易成本降低、物流成本降低、市场需求扩大以及服务业态多样化等方式促进了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发展对高铁开通的县域、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县域以及位于商帮文化发源地的县域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发展对于县域创业活动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激发县域市场活力,鼓励各类创业活动。首先,加强政策引导,积极鼓励消费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下沉市场,推动县域各类新兴服务业发展,带动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新业态,为县域地区群众提供更多公平包容的创业机会,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带动县乡产品融入更广阔的市场,激发县域市场消费潜力,带动下沉市场提质扩容。其次,优化平台功能设计,平台企业通过关键词优化、智能推荐等方式,帮助创业者快速找到所需市场信息、技术资源、政策解读等,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建立县域数据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全面的市场信息。此外,应当强化平台技术支撑,鼓励平台企业加大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投入,利用先进技术,提升交易速度和处理能力,提高快递物流系统等平台交易活动关键环节的效率,降低创业过程中的各类成本。

第二,持续优化县域数字营商环境,为企业打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赋能作用。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高精度识别企业所需,及时解决企业水、电、气等市政公用服务问题。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发展,大幅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履职效能。打造支持创业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信用水平,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和信息环境,维护良好的政商关系,给予创业者稳定的心理预期。适度适量降低新创企业的融资要求,拓宽新创企业的融资渠道。在市场扩容的基础上,提高县域市场环境承载力,努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各区域间产品和要素的流动,促进“新零售”和互联网消费等发展,缩短产品流通过程,降低流通成本。有效调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组合生态,在市场环境欠佳时,发挥政府引导调节的作用,在市场环境良好时,政府进行高效配合,实现两者的合理共存。

第三,根据各县发展基础和综合优势,有针对性地发挥地区物质和文化资源优势,鼓励大型平台企业拓展经营空间,深入参与县域产业体系建设,以此充分发挥平台经济带动就业和激发创业的作用。首先,各地政府需要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加强乡村地区公路与铁路、高速公路的连接,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医疗卫生等基本生活服务保障,努力解决流动人口二代教育问题,有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加强人才培养,积极鼓励平台、企业与院校联动培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多梯次的技能培训。同时,针对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则需要加大该地区创业人才市场的孵化培育,实现就业供需的有效对接,发挥各类龙头企业吸引人才的作用。最后,弘扬传统商帮文化的诚信价值观,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增强诚信意识,为新创企业营造守信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网络,降低企业初创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鼓励各地区根据本地文化和物质资源特色,借助数字平台开展系列招商引资和宣传活动,吸引更多劳动力和资金集聚,进一步提高县域创业活跃度。

值得指出的是,受当前数据与测度方法的局限,本文平台经济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衡量指标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是本文可能存在的不足。因此,寻找更为合适的指标衡量平台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是该领域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李宏彬,李杏,姚先国,等.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44(10):99-108.

- [2]张龙鹏,蒋为,周立群. 行政审批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家才能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16(4):57-74.
- [3]GUZMAN J, STERN S. The state of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 new estimates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for 32 US states, 1988-2014[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0, 12(4): 212-243.
- [4]白俊红,张艺璇,卞元超. 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22(6): 61-78.
- [5]陈勇兵,陈永安,王贝贝. 金融如何支持创业:基于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自然实验[J]. 世界经济,2022,45(12):99-128.
- [6]方世建,孙薇. 制度创业:经典模型回顾、理论综合与研究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34(8):1-10.
- [7]蔡莉,单标安.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2013(12):160-169.
- [8]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 [9]王奇,牛耕,赵国昌. 电子商务发展与乡村振兴:中国经验[J]. 世界经济,2021,44(12):55-75.
- [10]COUTURE V, FABER B, GU Y Z, et al. Connecting the countryside via e-commerce: evidence from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021, 3(1): 35-50.
- [11]李荣华,李想,鲁玉秀. 电子商务发展推动了县域服务业集聚吗? ——来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实证检验[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7):75-90.
- [12]LI L L, ZENG Y W, YE Z, et 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evidenc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China[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21, 100(2): 475-495.
- [13]方师乐,韩诗卉,徐欣南. 电商发展与农村共同富裕[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2):89-108.
- [14]潘嗣同,龚教伟,高叙文,等. 电商进村政策实施的就业效应与机制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4(4):141-162.
- [15]蔡跃洲,顾雨辰. 平台经济的社会福利机制及其效果测算——来自外卖平台商户问卷调查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23,58(5):98-115.
- [16]AMIT R, HAN X. Value creation through novel resource configurations in a digitally enabled world[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7, 11(3): 228-242.
- [17]陈梦根,周元任. 数字经济、分享发展与共同富裕[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10):5-26.
- [18]姜扬. 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创业发展——基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J]. 经济管理,2024,46(4):66-79.
- [19]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2020,36(9):141-155.
- [20]程聪慧,刘昱呈. 平台经济发展与农村创业活跃度[J]. 科学学研究,2024,42(10):2138-2149.
- [21]SARASVATHY S D.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26(2): 243-263.
- [22]SARASVATHY S D, DEW N. New market creation through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5, 15(5): 533-565.
- [23]KIRZNER I M.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24]TIMMONS J A, SPINELLI S.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M].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4.
- [25]董晓波,何昌磊. 电子商务发展能否提升城市创业活力? ——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27(1):67-84.
- [26]曾小明,尹延钊,周健. 数字经济与全球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分散化?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7(6):130-139.
- [27]谭伟杰,胡润哲. “智”巢何以引凤:智慧城市对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影响[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45(1):75-93.
- [28]KIRZNER I M.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 an Austrian approach[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1): 60-85.
- [29]WIKLUND J, SHEPHERD D A. Where to from here? EO-as-experimentation, failure, and distribution of outcome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 35(5): 925-946.
- [30]余文涛,吴士炜. 互联网平台经济与正在缓解的市场扭曲[J]. 财贸经济,2020,41(5):146-160.
- [31]杨伟国,吴邦正.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2022(4):2-16.
- [32]范子英,赵仁杰. 法治强化能够促进污染治理吗? ——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19,54(3):21-37.
- [33]张林,温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创业[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4):85-95.
- [34]王金杰,牟韶红,盛玉雪. 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村居民创业吗? ——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2):95-110.
- [35]丁俊发. 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研究[J]. 中国流通经济,2024,38(7):3-14.
- [36]戴魁早,黄姿,王思曼. 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吗?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2):90-112.
- [37]林嵩,谷承应,斯晓夫,等. 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23,58(3):40-58
- [38]黄勃,李海彤,江萍,等. 战略联盟、要素流动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 管理世界,2022,38(10):195-212.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County-Level Empirical Analysis

DAI Kuizao, LONG Xinyu, WANG Sima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Abstract: Currently,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till confront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supply of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constrained market scope, and scarc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Enhancing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has therefore emerged as a pivotal task for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ies. Endow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externality and economies of scale, the platform economy can not only mitigat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ut als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factor resources, thereby offering a viable pathway to address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of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ship. Drawing on county-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4 to 2022,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can elevate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ddressing endogeneity concerns and conduct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entrepreneurial costs and opportunities,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are primarily realized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expanded market demand, diversified service business formats, reduced transaction costs, and lowered logistics costs. Furthermor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 amplify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In addi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on entrepreneurship are more salient in counties with high-speed railway connectivity, those with a relatively larg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ose situated in the cradles of merchant guild culture.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Governments should prioritize the role of platform economies in stimulating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fully leverage the driving force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on county economies, invigorate local markets and demand, and encourage diverse entrepreneurial initiatives.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ounties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unleash the enabling power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cross sectors. Targeted use of regional material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encouraged, with large platform enterprises supported in expanding their operational footprint and in deeply engaging in county-level industrial syste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on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xplor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n the one hand, it extends the research frontier regarding how the platform economy empowers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lated to the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how the government can leverage the platform economy to address entrepreneurial dilemmas and invigorate the vitality of county economies.

Keywords: platform economy;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ntrepreneurial cos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编校:宛恬伊